

中国文化导论

主编 周忍伟
陈荣杰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导论/周忍伟 陈荣杰 主编.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3

ISBN 7-5628-1673-5

I. 中... II. ①周... ②陈... III. 文化-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185 号

——	书 名 / 中国文化导论
	主 编 / 周忍伟 陈荣杰
——	出 版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邮 编 / 200237
	电 话 / (021)64250306
	网 址 / www.hdlgpress.com.cn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	印 刷 /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9.625
	字 数 / 154 千字
——	版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 1—6 050 册
——	书 号 / ISBN 7-5628-1673-5/G·252
	定 价 / 15.00 元

序

周忍伟、陈荣杰二教授请我为《中国文化导论》作序，深感荣幸。该书的出版及课程建设的成功使我惊喜地发现，这正是我多年来心有余而力不能及的期望。

大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传统意义上，大学以传播知识、创新知识、储存知识为天职，承担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其核心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具有人文精神及科学精神的高层次人才。

由于处在激烈的升学和就业竞争阶段，今日的大学生面对着更多的名利诱惑及生存发展的压力，有时无暇顾及必不可少的人文知识，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及背景知识，而这必将会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周、陈二教授主持的公共必修课“中国文化导论”犹如雪中送炭，为丰富、充实大学生的人文知识，进而实现其人文精神的建树和提升，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为通过调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而调节其能力结构提供了重要契机。

没有知识的传授,就谈不上精神的传授,但是有了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不一定表明就拥有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知识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更新和老化,然而其中所蕴含的先哲们的伟大精神和深邃智慧,诸如独特的观察视角、分析途径、解决方法等,置于今日依然光彩照人。它们仍在很大程度上、至少部分地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和实践。所有知识上升到最高境界都是哲学,所有从不同观点出发获得的投影之高度综合才是事物真实的形象。兼容并蓄、由表及里、去粗取精,掌握知识中所负载的精神内容,这是大学生们在阅读此书时可取的学习态度。祝愿各位大学生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实现在精神上与先哲们的对话,从而成为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的青年才俊。后成“家”,先成“人”。

祝《中国文化导论》走向更大的成功,祝大学生们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

国家 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5 年 2 月 2 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文化”和“中国文化”.....	2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自然环境.....	7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社会基础	12
第二章 儒家文化	18
第一节 礼的起源与意义	19
第二节 孔子的仁学	28
第三节 孟子和荀子的发挥	35
第四节 儒学的制度化	49
第五节 儒家的人格理想	60
第六节 儒家与现代社会	67

第三章 法家文化	78
第一节 先秦法家的变法	80
第二节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	88
第三节 法家与秦汉政治	97
第四节 法家与传统文化	112
第四章 道家文化	119
第一节 老庄之道	121
第二节 道家思想与士大夫精神人格	134
第三节 道家与中国艺术精神	141
第四节 道家思想的运用	147
第五节 道家与当代文明	153
第五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	158
第一节 佛教概说	159
第二节 佛教传入中国	168
第三节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178
第四节 禅宗与现代生活	201
第六章 道教与神仙信仰	210
第一节 道教的产生与发展	212

第二节 道教的神仙世界·····	223
第三节 道教的养生理念与修炼方法·····	239
第四节 道教与传统文化·····	253
 第七章 中国近代文化·····	 266
第一节 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	268
第二节 文化重建和新文化运动·····	278
 后 记·····	 294
 参考文献·····	 296



第一章



导摇摇论

一个加拿大人这样写道：“中国人把建立人际关系看得很重要。这让我很难理解。我认识一个在加拿大的中国学生，他毕业后进了加拿大公司工作，他想把一个同学介绍进公司。他们仅仅是同学关系。但是这个中国学生向老板施加压力，要老板给他的同学工作。比如他会介绍这个人如何如何好，然后每天都去问老板：你考虑得怎么样了？如果是我，只会提出建议，仅此而已。加拿大人也会发展同别人的商务、学业的关系，但是不像中国人看得那么有价值。加拿大人交朋友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因为他能带来帮助。在加拿大的时候觉得中国人很奇怪，但是当我到中国以后，就觉得不奇怪了。这是不同

的文化。”这个加拿大人在探究中国人为人处事的独特方式时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他这样做并不是故弄玄虚。人是文化的存在，人的行为和意识最终由他们的文化所决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行为和意识，必须从我们的文化背景中予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节 “文化”和“中国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传统的用法上指的是“文治教化”，与“武功”对举，也就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等等，如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但当今被大家使用的“文化”一词却转译自日本，对应于拉丁文的 ~~文化~~ ~~文治~~ 其基本要义是指对农作物的培植，后被引申为对人类心灵、情操、知识的培养。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1871年）中将它定义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泰勒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由于各个学科、各个学派的引申，“文化”衍生出两百多个定义，但追

溯其来源,莫不出自于泰勒这一经典性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不同层面并且各层面间具有互动作用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如美国学者克罗伯、克拉克洪所概括的:“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显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①目前学术界将这个系统大致区分为三个层面,换言之,人类的“文化”现象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把握。

最表层的是物态层面的文化,或称“器物文化”,指的是物质形态所表现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包括人类加工创制的各种器具,例如衣裳、冕帽、鞋、袜,再如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宫殿、平房、楼房、窑洞、帐篷等等。文化中最直观的便是这种物态文化。提及中国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长城、故宫、苏州园林,以及瓷器、茶、旗袍等等。

处在这一层面之下的是制度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是

^① 转引自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 页。

指通过社会实践而建成的规范人们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包括制度、法律、礼仪、习俗和机构组织等等。

再深入的一个层面是意识层面的文化,指以语言文字为传播符号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等。

中国文化,当前也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鉴于华人目前遍及世界各地而称之为“中华文化”或“华夏文化”,有的则鉴于当前的中国文化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中而称之为“传统文化”。但不论其名称如何,所指向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我们这里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以儒家为主导而融合释、道的文化,三教之间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交织汇合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就政治文化而言,则又有儒家与法家的融合。

中国文化尽管历史悠久,但自汉末以来就形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主,以释、道为辅的相对稳定的形态。这里,秦代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并在政策上有意识地对文化统一作了极大的努力,为中国文化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创造了条件。自汉武帝独尊儒学到汉末释教东传、道教产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时代,到唐宋以后就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潮。这一思潮在一千多年

里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没有产生过断裂或本质上的变化,一直到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进入转型时期,也未有大的变化。在区域差异方面,尽管从各个区域的特殊性来看,彼此间的差别是存在的,但这些差别多半存在于制度行为层面,在意识层面则仍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同属于一个有机复合的整体。为了辨明流变,理清脉络,本书分别从儒、道、释三个方面,以及它们和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导而融合释、道的文化。关于传统,当代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指出,它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积淀,它包括物质产品、思想观念、惯例和制度。它使代与代之间、不同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① 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但现实又是历史的延续,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① [美] 希尔斯:《论传统》,傅理、昌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同时也带来因袭的重负,不管我们是否自觉,我们终究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传统是社会的一种生存机制和创造机制。借助于它,历史才得以延续、发展、飞跃,社会的精神成就和物质成就才得以保存和实现。因此,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必须了解传统文化。

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加,世界几乎成为一个“村庄”。这固然要求我们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另一方面,更要求我们掌握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我们毕竟是作为“中国人”参与“地球村”的合作与竞争,我们可以穿西服、讲英语,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方式不可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和传统。传统文化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支撑着华夏儿女顽强、坚定地迎接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挑战,生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53页。

不息,继往开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成为具有“中国心”、“中华魂”的一代新人,承担起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自然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精神的基础。

中国大陆地势西高东低,依次递降,呈现出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山脉与河流多东西走向,从大兴安岭西坡,沿西辽河上游、燕山山脉,斜穿黄河河套,经黄河、长江上游,直抵雅鲁藏布江河谷,可以画出一条 ~~源同~~ 毫米等降水线。这条等降水线的东南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区,适宜农业;西北则为干旱地区,繁衍着以游牧为生、全民善于骑战的游牧民族。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经过黄土高原,在现今的河南省进入海拔很低的平原,最后东流入海。黄河中下游平原以及泾、渭、洛、汾等支流冲积平原,古代称之为“中原”或“中国”。中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处于北温

带,相比而言,更适宜农业发展。而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常常泛滥改道,当时华北平原北部还有众多单独入海的河流,所以有不少地方会受到这种泛滥改道的影响;近海地带由于地下水位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较严重。黄河中下游一带是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地区。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很早就由以渔猎、采集为生过渡到以农耕为生。传说中的神农氏是中国农业的始祖,“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羸蠃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五谷。”(《淮南子·修务训》)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成果,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的中部和北部、山西南部、陕西的关中盆地、河北西南部和山东西部。

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生最早的国度之一,六七千年前,华夏先民就进入以种植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对先民从事农业的赞美。《史记》说周人的祖先弃为小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稿焉,民皆法则之”,之后他又成为尧的老师;又说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都反映了古人融融的农耕生活。至殷商西周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生活资料

的主要来源,如秦岭淮河以北成为以小麦、粟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农业区,秦岭淮河以南成为以稻米为主要作物的水田农业区。人们十分重视农业,夏王朝为政者认识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商王朝注重农耕,甲骨文中有关“求禾”、“求雨”、“求年”的记载很多。周代的“周”字,甲骨文很像划割的农田,说明周族的起源与农业有关。周天子每年的“籍田”大礼,被看作国之大事、国之定制。

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细腻而疏松,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农耕区域的向南扩展创造了社会条件。汉晋以来的数百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的蹂躏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中原的农耕男女大批向南迁徙。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



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苏杭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东南财赋”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

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中国文化扎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土壤,对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人注重实际,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久而久之形成了勤劳务实的民族性格,重实际而黜玄想。中国古代贤哲一向提倡“君子务实”,朴实、勤劳、埋头苦干一直是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人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厌恶虚夸、巧取。另一方面,这种偏重实惠与眼前功利的民族性格又限制了生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急功近利,追求即时的效益,就是这种“吹糠见米”的小农意识的表现。中国古代基于实用的农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十分发达,而纯科学性的玄思,不以实用为目的的探求自然奥秘的文化极少,即使有也受不到社会的重视。

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农业生产与定居密切相连。农业民族为适应农耕的需要,起居有定,耕作有